看来确实，论文要比系统性的综合叙述要来得容易一些，无怪乎论文集的数量这么多了。雷海宗这本《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》依循此例，集中论述中国古代兵的精神（主要集中于东汉以前），中国的元首、家族，作者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历史分期的见解，关于抗战建国的看法，并附论有一些其他的短篇论文。

作者并未采纳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理论体系，自然也没有堕入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里去。作者似乎也没有完全的使用某一当代的西方理论流派为支撑，可以看到文字中同时受现代西方与中国传统的影响，如在“封建”概念的使用上，作者仍以中国传统有之的用法。或许也是出于此独立之精神，使作者在后来遭逢大难。由于种种限制，作者的分析当然在许多方面都失之于简单，进而其结论未免有偏颇不当之处。既然作者并未从教条主义出发，其研究仍旧有诸多可观的地方。

东汉在最大的一次外征，窦宪于和帝永元元年（西元89年）的征伐匈奴的战役中，所用的兵大半是外族。若果真如此，则颇为有趣。在古代的中国，陈寅恪的说法是不谬之论，即民族的划分主要看的是文化，若认同、学习汉文化，即为汉人，浸染、操习胡人习惯，则视为胡人。不知道，东汉此时的外族，是否得以汉化，还是只是单纯的用其人而已？而后来似乎除了唐代以外，似乎不见有过像东汉这样军中大半外族的例子，又是为何？这些值得更深入的研究。

作者对中国历史做出的这种分期标准，笔者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作者以西元383年的肥水之战为界，将中国历史分为“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”与“北方胡族屡次入侵，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两周。即使按作者所提出的标准，以肥水之战为界似乎也并不见得合适，“外族”文化的影响，至少在东汉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（佛教），“五胡乱华”也早发生于肥水之战近一个世纪以前。且此分期方法也过于简略，不能够体现诸多的重要变化。不过直到现在，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仍是需要被严肃的讨论的，现存的大体上还是不能令人所满意，这需要中国“新史学”的出现。

作者的思考似乎有这样一个趋势，过于重视汉及以前的时代，忽视了后来中国历史的诸多重要的变化，似乎秦以后的中国，真成了“比较静止”的了。这大概是一种对中国历史的“静态”的误解，或多或少也见之于其他许多的学者身上。